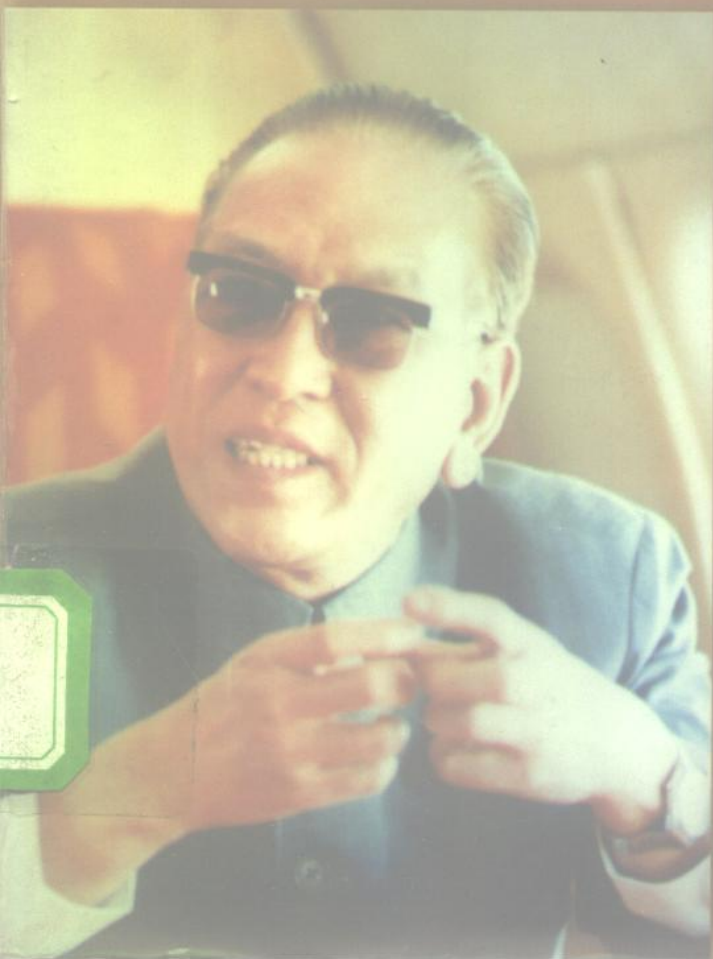


耿飚回忆录

(1949~1992)



耿飚回忆录

(1949~1992)

江苏人民出版社

书 名	耿飚回忆录(1949~1992)
著 者	耿 飚
责任编辑	吴 源 马洪才
责任校对	宗 媛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展望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南京五四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625 插页 8
印 数	1—10140 册
字 数	221 千字
版 次	199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2045—9/K·291
定 价	(软精) 20.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脱下军装干外交	1
	将军荟萃外交部	1
	怀仁堂内学礼仪	13
	毛主席接见十大使	21
第二章	从北京到北欧	28
	奔赴斯德哥尔摩	28
	一人任三使	34
	第一次招待会	41
	与联合国秘书长的秘密会谈	47
	添砖加瓦砌“炉灶”	54
	无形的桥梁	62
第三章	南亚热浪	70
	调任驻巴基斯坦大使	70
	“打开西面的大门”	79
	周总理访巴	88
	“援助是相互的”	98

DP99/3328

	“我们什么也不要”.....	105
	异国故人来.....	111
第四章	外交部内外	121
	副部长们.....	121
	签订边界条约.....	130
	陪同陈毅出访.....	137
	签订中国印尼友好条约.....	146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153
	种豆捕鱼打黄羊.....	162
第五章	再度出使邻国	168
	“又要你去当大使了!”.....	168
	“我们都是将军出身”.....	174
	海滩上的宏论.....	179
第六章	新中国外交正确辉煌	187
	挺直脊梁办外交.....	187
	坚持和平外交.....	195

	开展国际经济合作·····	203
	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	211
第七章	风雨十年忆“文革” ·····	220
	挨批斗琐记·····	220
	“策划人就是我!”·····	232
	敢说阿尔巴尼亚的“坏话”·····	241
	调任中联部长·····	247
	得罪“四人帮”·····	263
	心碑永存·····	271
第八章	春风又绿中华 ·····	284
	接过华国锋手令之后·····	284
	政务军务忙·····	296
	出访传友谊·····	302
后 记	·····	312
附 录	耿飚的戎马生涯 ····· 蔡华同	313

第一章

脱下军装干外交

将军荟萃外交部

1950年年初，刚过阳历年，我们十九兵团司令部就忙开了。参谋们有的在起草文件，有的在核对资料，有的在打电话，我则在批阅一份报告。忽然，通讯员进来叫我：“副司令员！李政委和杨司令员请您过去一下。”

“老耿，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中央来了命令，要调你到北京去做外交工作。”李志民同志一见到我，就笑眯眯地对我说。

“什么？调我去干外交？”我感到十分意外。因为，自参加红军之日起，我早已把自己和人民军队联结在一起；虽然在党的领导和人民的支持下，经过20多年战斗，现在已经打下革命江山，但我决心还要为保卫人民胜利果

2 耿飚回忆录

实，为保卫祖国建设而继续紧握枪杆子；而且，从个人感情上说，我也舍不得离开长期在一起工作的战友，离开一道浴血战斗、生死与共的广大指战员。

杨得志同志和李志民同志从我的表情上看出了我的心事，就一唱一和地劝我：

“老耿，你以后还可以来兵团走娘家嘛！”

“枪杆子当然重要，但是搞外交也同样重要啊！”

“挑你，算是挑对了！扳着指头数，我们这里也只有你最适合搞外交！”

其实，他们不劝说，我也决不会不同意调动工作，因为：首先，对于中央的命令，我当然无条件服从；其次，我也明白外交工作的重要性。我只是对部队、对战友以及对驻地人民群众，有一种浓郁的依恋之情，因而舍不得离开他们。

春节刚过，我便奉调携眷来到北京，临时住在华北军区招待所。招待所所在的隆福寺一带，是有名的繁华地区，孩子们一到，就嚷着要去逛街看热闹。但是，我却迫切地想去看看天安门。我把这个想法一说，孩子们鼓掌欢呼，连赵兰香手里抱着的仅两岁的小女儿，也在不停地拍着她那双小手，而且他们吵嚷着要求马上去。于是，冒着摄氏零下十几度的严寒，我们来到天安门前。

一阵寒风吹来，使我不由自主地赶紧翻起了军大衣的领子。当时，长安街南面棋盘街一带的房子尚未拆迁，天安门广场要比现在小得多；也许由于京郊的防风防沙林带尚未种植的缘故，那时广场上的西北风比现在要强

劲寒冷得多，吹在脸上和颈间，好像刀刮般地疼痛。所以，我急忙把孩子们的棉衣领子也翻起来。

虽然天气是这样寒冷，可是此刻我的心里却是热乎乎的。

巍峨的天安门，在初春的阳光显得更加雄伟壮丽。

仰望天安门城楼，我仿佛听见：毛主席在开国典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那响彻云霄的声音，依然回响在广场上空。

记得数月前举行开国典礼时，我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正在西北前线。当我们在司令部里，通过电波听到毛主席那庄严而洪亮的声音时，大家都激动地跳了起来。但是，我在欣喜中又觉得有些遗憾：未能处在天安门前群众的洪流中，直接聆听那开天辟地的一声春雷，亲身经历那伟大时刻的伟大场面！当时我就暗中告诉自己：下次去北京时，一定要到天安门前补上一课，补充体会一下当时激动人心的情景，以弥补未能亲身参加开国盛典的损失。

现在，我站在人民领袖宣布新中国诞生的地方，站在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下，不禁胸中热血沸腾，脑中思潮起伏……

这是我第三次来到北京。

回忆四年前，即1946年初，我奉中央的命令和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的嘱托，第一次来到北平，参加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工作。那时，我作为军调部我方代表团的副参谋长兼交通处长，在叶剑英、罗瑞卿、李克农的领导下，

参加了和美蒋代表在谈判桌上的激烈斗争，还经常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跟踪和监视。由于北平恶劣的政治环境，尤其是目睹北平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使我对这个古都产生了并不良好的印象，觉得这是个灰暗、阴沉、令人窒息的破旧大城市。

第二次来这里是1949年初。那时我们第十九兵团参加了平津战役。北平和平解放后，我们迈着雄健的步伐，精神抖擞地举行了人民解放军入城式。面对着回到人民手里的新生的古都，我们的脸上都荡漾着胜利的微笑；军营里和城内城外，到处洋溢着欢乐的气氛，到处飘扬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那动人的歌声。

一年以后的今天，我第三次来到这里，感觉又是不同。因为，现在的北京，已经成为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在这里，党中央和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和周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和朱总司令，一面指挥着向东南、中南沿海岛屿和西南地区继续进军，以便解放全中国，一面正在筹划绘制着建设新中国的蓝图。因此，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我此刻仰望着天安门城楼上庄严的国徽，在保持着革命胜利的喜悦的同时，也感受到了“建设新中国”这副担子的重量。因为我知道，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胜利并不意味着革命的终结，而是标志着更艰巨的新的征程的开始。

长安街上有轨电车的“当当”声和孩子们的欢笑声，打断了我的思绪。

“这是什么？”

“那是哪里?”

孩子们用戴着棉手套的小手指指点点地发问,又一次打断了我的思路。

“这是华表。那是天安门。”我答道。

“华表是升旗的吗?”

“不,那边的旗杆才是升旗的;这华表是古代的东西。”

“古代用它来干什么?”孩子好奇心强,总爱打碎乌盆问(纹)到底。

我还来不及回答,另一个问题又来了:“为什么叫天安门?”

“这个么,有个很长的故事,在路上说不完,等回去再给你们讲吧!”

清早,我开车来到外交部。这是一辆军用吉普车,我在十九兵团时经常开着它到各军的军部和部队基层去办事。这次来京前,李志民政委和杨得志司令员要后勤部把这辆车交给我带走。我考虑到外交部刚建立不久,车辆和司机一定缺乏,到京后自己带车可以减轻机关的负担,所以接受了他们的盛情。现在,我每天开着这辆吉普车到外交部上班。

今天,我心中异常高兴,因为昨天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同志告诉我:周总理今天要找我谈话。

我和周恩来同志已有许多年未见面了。记得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北平军调部的时候,那时他为揭露和挫败

国民党发动内战的阴谋，为争取国内和平而日夜操劳，面容显得消瘦。所以，当我走进总理办公室之前，头脑中自然而然地闪现出他当年的形象。可是，我一进门便惊愕地发现：周总理神采奕奕，显得比前几年还要年轻得多。虽然听说他刚出访苏联回来，在莫斯科时他协助毛主席和苏方经过 20 多天会谈，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但是此刻在他脸上却丝毫看不见由于日夜辛劳和长途旅行所产生的疲劳迹象，反而满面红光，精神焕发，浓眉下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中蕴含着充沛的精力。

“总理，您好！”我轻轻叫了一声。

“哦！耿飚同志，你来了！”总理那略带苏北口音的清晰、好听的声调，使我倍感亲切。

等我在他对面坐定后，周总理就开门见山地说：“这次把你从部队调来，是由于外交工作需要。”

周恩来同志的工作作风，素来以严谨、认真、踏实、细致而闻名。他在向部属交代任务时，必定要详细说明事情的来龙去脉、背景材料、注意事项和有关情况。记得 1944 年 9 月，他要我把一个美军观察组从延安带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临行前，他向我详细交代了有关情况，连如何行军都作了周到的安排和布置。他的谆谆嘱咐，我至今记忆犹新。现在，他又按照这一贯作风，向我详细讲述起建国以来数个月内外交战线的形势和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诞生，就得到苏联和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等国的承认，接着，

越南、缅甸、巴基斯坦、印度、阿富汗、尼泊尔、锡兰(后来改国名为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英国、挪威、丹麦、芬兰、瑞典、瑞士、荷兰等国也相继发来贺电承认我国。

按照外交惯例,国与国之间一经互相承认,便算开始建交。但是,鉴于有些国家仍和逃到台湾的国民党集团保持着“外交关系”,所以我国政府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规定,坚持只有当这些国家明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宣布同国民党集团断绝“外交关系”,并同意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才能与之正式建交。因此,到现在为止,我国已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一些国家则在进行谈判之中。

随着外交工作的开展,需要大量外交干部。这些干部从哪里来呢?主要的来源是:一,原来在解放区做外事工作的同志,曾在八路军驻重庆、西安等办事处和驻南京、上海的中共代表团工作的同志,还有在军调部我方代表团工作过的同志;二,从部队调集一批适宜做外交工作的同志;三,从文化界和其他部门调集一些熟悉外事和国际问题的同志;四,选拔一批德才兼备的大学生。

“现在,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同志早已赴任,但是驻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大使尚未派出。这次中央从各个野战军

调来一批领导干部，就是作为驻外大使的人选。”说到这里，周总理转过头去向坐在旁边的章汉夫副部长问道：“有几位已经来外交部报到？”

章汉夫同志扳着指头答道：“有袁仲贤、姬鹏飞、黄镇、王幼平、谭希林、曹祥仁、倪志亮、彭明治……”

“好！”周总理点点头，然后又对我说：“他们都将是新中国首批驻外大使。但是，把你调来，是准备任命你为驻联合国的军事代表。”

“驻联合国的军事代表？”面对这个意外的任命，我的声调中带着几分惊讶。

“怎么？有点出乎意料？”总理听出了我的惊讶之意，便问我：“你知道联合国这个国际组织吗？”

“不太了解。”我答道，“但我知道中国是联合国的发起国之一，还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听说，董必武同志曾在联合国宪章上签过字。”

“是啊，”周总理似乎对我的回答感到满意，露出了赞许的目光，“董老是当时三名中国代表之一。”

现在，那个已经不代表中国人民的蒋介石集团，在美国的支持下，还窃据着联合国内的中国席位。

新中国建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就通过决议，不承认蒋介石集团的代表出席第四届联合国大会的资格。建国后，周总理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严正指出：“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才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要求立刻取消所谓“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参加联大和联合国各

机构一切活动的权利。他还致电第四届联大主席罗慕洛，坚决否认蒋帮代表团的合法性。

与此同时，中央决定任命张闻天同志为出席联大首席代表，着手组建我国参加联大的代表团。1950年1月中旬，我国外交部发出照会通知联合国：中国政府已经任命张闻天为出席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的首席代表，要求将蒋介石集团的代表立即从联合国及其所属各个机构中驱逐出去。

“因此，从现在起，我们要作好出席联大的准备。”周总理说。接着，他看着我问道：“你对于这次工作调动，有什么意见？”

我连忙回答：“坚决服从命令。不过，我对外交一窍不通。”

“可以边干边学嘛！”总理笑着说，“再说，抗战时你不是曾经带领美军观察组从延安到晋察冀吗？在北平军调部不是还和美蒋代表在会议桌上打过交道吗？实际上你已经接触过外事工作了。这次决定派你到联合国去，也是考虑到了你的这些经历。”

我十分佩服周总理的记忆力，在他日理万机的情况下，竟对许多年以前的这些细节，仍然记得这么清楚！

“可是，”我心里还是有些不踏实，“我对联合国的组织机构、开会程序等都不了解，尤其是对我国的外交政策还不清楚，那怎么行！”

“这些，可以慢慢学嘛！”周总理翻开一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说，“至于我国的外交政策，这里

规定了它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概括起来就是：为了独立，为了和平，为了友谊；反对侵略，反对战争。当然，目前我国的外交政策还有一个原则，那就是：一边倒。你读过毛主席关于‘一边倒’的论述吗？”

“记得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谈过这个问题。”我回答。

“对！”周总理用他睿智的目光注视着我，“毛主席指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对没有第三条道路。现在帝国主义正在反对我们，正在处心积虑地企图颠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正在全世界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因此，我们当然不能倒向帝国主义，只有向社会主义一边倒！”

他喝了口水继续说：“所以，我国现在的外交任务，分成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以及其他友好国家建立友谊，加强团结，为争取持久和平、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前途而奋斗；另一方面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由此决定了我们的外交工作也有两个方面：一面是联合，一面是斗争。这在联合国的工作中更要多加注意。”

周总理的这番教诲，使我顿开茅塞。特别是他概括的“为了独立，为了和平，为了友谊……”这几句话，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以后数十年中，一直是我国开展外交所遵循的原则，并从而形成了我国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我参加了出席联大代表团的筹备工作。

张闻天同志是我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从遵义会议起，到延安时期的前几年，一直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他革命经验丰富，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很高。他也是一位杰出的笔杆子，曾亲自起草富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决议和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决议，并写有许多有份量的具有指导性的政策文件和文章。去年中央调张闻天同志到外交战线协助周恩来同志工作，后又命他到莫斯科去筹建驻苏使馆。建国前夕，中央政治局决定任命他为出席联合国大会首席代表（也是常驻联大代表团团长），就把他从苏联调回，改派王稼祥同志为我国驻苏大使。

当我向张闻天同志报到时，他异常高兴地对我说：“啊！老战友来了，欢迎，欢迎！”

我赶紧说道：“老战友这个称呼不敢当，您是老领导，又是我的老师。”

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第一次见到张闻天同志是在1934年中央苏区举行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上。那时他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他在会上作过一个生动的报告，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长征到达陕北后，我在红军大学第一期（从第二期起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学习，洛甫同志（即张闻天）经常来校讲课，我曾多次向他请教理论问题，渐渐就熟悉起来。

“但是现在我不是老师了，我们共同配合工作。”他谦